

合力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点痛点

陆敏

深度观察

乡村振兴政策红利频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迎来新的重要节点。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既是解决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现实需要,也是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国有大型银行不断下沉服务,使得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得到大幅提升,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深入,农村金融服务短板日益凸显。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虽冠以“农”字头,但在设计上与农村产业的实际脱节,无法有效满足实际需要。

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农业农村发展实际供需不匹配的情况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银行服务农村地区存在重存款轻贷款、重抵押轻信用贷款的现象,“三农”关键领域缺少资金支持;二是银行对一般农户的小额普惠贷款发放较多,对小型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投放不足;三是银行之间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各自出招,信贷投放较为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一些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资金缺口较大,容易陷于推进不畅的境地等。

农村金融服务亟待升级。从政策面来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对金融业加大支持乡村振兴力度提出更高期许,这也意味着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被提到了全新的高度。去年10月,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到今年4月,浙江农信联合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动和实施的。

乡村振兴政策红利频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迎来新的重要节点。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既是解决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现实需要,也是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银行业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优化涉农金融供给上更主动作为。银保监会4月发布的《关于2022年银行业

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优化涉农金融供给体制机制。政策性银行要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强化对农业产业发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大中型商业银行加大首贷户拓展力度,更多为此前未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等地方法人银行机构不断增强乡村振兴服务能力,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

政策性银行在支持乡村振兴中尤其具有天然优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造、农业科技等一些涉农项目需要长期投入,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短期回报率低,商业银行的传统金融产品较难匹配这些项目的融资需求。而政策性金融兼具了金融和财政双重属性,能够提供长周期、低利率的信贷资金,能较好弥补商业银行的不

足,避免商业银行在服务农村金融中出现失灵问题。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拟创新推广县域全方位综合化金融服务模式,为符合条件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探索提供长期、稳定、大额、低成本信贷资金,就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有益尝试。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参与者,除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引导更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如证券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经营主体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培育一批高质量的涉农上市公司,助推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目标实现;保险公司的产品可补充农村信贷的不足,增强农户对抗农业不确定性的能力,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后盾和有力保障;保险和期货公司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保险+期货”服务,探索推动更多特色农产品成为期货交易品种,支持农业农村经营主体通过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进行风险管理,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和金融衍生品之间的联动机制等。

此外,相关监管工作还有待加强和协调,涉农金融通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顺畅。各方要用时不我待的精神,积极破解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难点痛点,为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提供更多金融助力。

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2021年我国脱贫人口就业规模达到3145万人,脱贫人口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67.9%,为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返乡留乡农民工增多,外出就业难度加大,脱贫人口稳岗就业面临新的挑战。近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要以政策实施为契机,注重优先顺序,打好组合拳,突出抓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政策导向要突出稳规模、增收入。把“确保今年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确保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速”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加强劳务协作,让脱贫人口“走出去”。外出务工是脱贫人口“回得来”。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等特色产业,搭建园区就业供需平台,培育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启动一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项目,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拓展就业岗位。强化返乡创业载体建设及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发展劳务经济,激活就业岗位。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100多万,综合测算,一个返乡创业项目平均可吸纳6到7位农民稳定就业、17个灵活就业岗位。加强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用好公益岗位、帮扶车间等方式。

政策投向要兼顾用工方、务工方。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须供需双向发力,力求用工务工互动共赢。应支持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落实企业稳岗扩岗贷款贴息、社保费缓交、租金减免、用地优惠等支持政策,持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支持力度,并通过财政资金及一些产业优惠政策帮助市场主体加快复工复产,扩大用工规模,挖掘就业潜力。健全重点领域服务保障机制和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协同机制,完善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的奖补政策。比如,对吸纳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半年以上或超过一定人数的用工单位,按人数给予一定标准的吸纳脱贫人口就业补贴等。积极扶持脱贫人口就业创业,及时兑现对脱贫劳动力的就业帮扶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优化。比如,可适当提高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补贴标准,对因疫情影响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回流人员,年内再次外出务工的,给予二次交通补贴。对有创业意愿的,积极提供咨询评估、项目策划、资金奖补兑现等服务。

政策指向要注重精准性、时效性。政策出台之后,关键要落地落实落地。在提高精准性上,一户一策,因人制宜,突出针对性。比如,根据脱贫人口的劳动能力强弱分类帮扶,对普通劳动力、技能劳动力,注重帮扶外出务工、企业务工;对半劳动力、弱劳动力,注重通过公益性岗位等兜底。又如,根据脱贫人口的务工经验情况分类帮扶,对返乡回流的脱贫劳动力,坚持“再出去”和“留下来”相结合,引导他们参与产业,扶持他们返乡创业;对新成长劳动力和脱贫家庭大学毕业生,加强学校、地方、企业间合作,促其毕业后及时就业创业。在提高时效性上,着眼当下,兼顾长远,注重抓根本。能快速见效的政策举措,抓紧实施;事关长远的政策举措,统筹推进。比如,对暂时无法重新就业的返乡回流脱贫劳动力,增加转岗再就业培训项目,简化程序落实培训补贴政策,“线上+线下”开设技能培训与就业对接专门窗口,帮助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水平。又如,推动落实企业用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等责任,完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等,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谢茹

给“后备厢市集”提个醒

包元凯

近日,在江苏南通举办的购物节上,“后备厢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夏季来临,后备厢市集火了起来。不少地方的大街小巷上,打开车辆后备厢,日用百货、小吃零食、玩具布偶……琳琅满目的商品呈现在路人眼前。

后备厢市集规模不大,作用更多体现在丰富城市生活体验、释放一定消费需求、满足人们社交愿望等方面。同时,后备厢市集还为经营者带来了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后备厢市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

需要提醒的是,后备厢市集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赖于多方共同努力。

后备厢市集发展要符合城市治理要求。目前,许多此类市集没有固定的、安全的经营场地,部分经营者更像“流动摊贩”,在路边把车一停,就“开门营业”,可能存在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威胁交通安全等情况。有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随意丢弃垃圾,破坏市容市貌,增加环卫负担……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一定麻烦。

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部分经

营者售卖小吃零食,但其一般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缺乏相关资质。同时,开放的加工场所也无法保证食材、厨具、餐具的卫生情况,增加了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的风险。要妥善处理好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随买随走是后备厢市集的一大特色,但这也导致了消费者消费缺乏凭证。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最终也只能作罢,吃哑巴亏。

在疫情多点散发的当下,后备厢市集发展要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后备厢市集给疫情影响下的城市带来了久违的烟火气,但容易造成人群聚集。尽管是室外空间,但仍需做好疫情防控,不能丢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之,对于后备厢市集,既不能一抓就死,也不能一放就乱,这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智慧,需要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交通等行政部门推出有效举措,比如开辟专门营业场地、限制商品经营范围、规范市集经营行为等。同时,经营者也应爱惜自己的羽毛,在产品安全、场所维护、疫情防控等方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共同呵护后备厢市集的健康发展。



徐骏作(新华社发)

发挥好国家植物园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惠民生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广州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再次取得阶段性成果。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根源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能力建设不足。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我国昆明召开,再次强调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呼吁各国携手加强体系和能力建设,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华南国家植物园和此前设立的北京国家植物园,均由政府主管部门、国家级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是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新做法。就保护体系建设而言,这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管部门与植物园建设主管部门合作,避免出现“有植物无场地”或“有场地无植物”;也有助于加强国家级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合作,用科研成果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为植物多样性科研工作提供有力支持;还有助于落实地方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体责任。

就保护能力建设而言,这有助于凝聚力量,完善总体规划,增强科研支撑、落地具体实施,增强植物迁地保护管理能力;发挥好国家级科研机构在全国植物保护科研领域的领军作用,推动植物野外回归和就地保护;促进科研和科普融合发展,通过科研人员的参与,完善科普人员的理论知识体系,提升植物科普宣教能力。

国家植物园建设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能力建设提供了新“实验田”,促进了

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工作具有复杂性、挑战性和探索性,难以一蹴而就。华南国家植物园以华南植物园为基础建设,此前华南植物园不仅承担了国家植物园被赋予的科研、科普、展示、迁地保护职能,还承担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职能,研究生培养教学职能,由此可能带来国家植物园设立后职能不一的问题。因此,后续建设工作不仅要优化职能,还要对机构设置、人员队伍等进行调整。北京国家植物园也面临整合后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需加以解决,以实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统一。

今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围绕特色下功夫,着力破解这项创新做法可能带来的管理体制机制、文化环境等方面问题。一是要建设有特色的土地利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管理制度,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区域发展战略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上,做到特事特办;二是建设有特色的植物采集、投入保障等机制规则,在符合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做到特事特办;三是建设有特色的文化环境,形成多部门、多层次的高效协作工作氛围,做到特事众办。

此外,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还需要一支有特色的人才队伍,不仅要有高水平的科学家、科普专家和管理专家队伍,也要吸纳社会公众成为国家植物园建设的参与者,从而有效提升国家植物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体系和能力。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医保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位参保人。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及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意味着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即将正式启动。与去年相比,今年医保目录调整新增了儿童药品、仿制药品等。更多儿童用药进医保,能对医药市场起到引导作用,鼓励更多企业专注儿童用药研发。另外,此次工作方案首次提出,对拟纳入医保目录的非独家药品,采用竞价等方式同步确定医保支付标准。这将更充分地发挥医保基金杠杆作用,对药品使用结构和市场价格机制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为患者带来福音。

(时锋)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阻力何在

李勇坚

全面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使数字化技术深入到产业内在的运作流程、研发设计、生产方式、组织模式等各个方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在数字技术方面已有一定储备,消费互联网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全球知名的平台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共有企业4842万户,其中99%以上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产业各个环节的信息协同度,构建全链条、全流程数字化生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金融成本。

不过,受供给、需求、人才、资金、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水平仍较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指出,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12%的企业处于应用践行阶段,达到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仅占9%。这说明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有阻力,进展较慢。

从主观上看,不少中小微企业仍存在不愿转型、不敢转型的问题。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基础弱,

数字化转型需要从数据收集、生产流程、管理模式等底层结构开始,工作量大,耗时长,从初步实施到转型实现需要7年至9年,短期内效益不明显。不少企业因此有畏难情绪,不愿开始数字化转型。转型也意味着企业数据等需要上云,出于对企业财务、技术等商业机密数据的安全考虑,很多企业不敢进行数字化转型工作。

从客观上看,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成本高、资金投入量大、适用方案少、人才短缺等问题。数字化转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设备制造、系统运维、人力资源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这在前期很多都需要一次性投入,对企业现金流有着不小要求。从现有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来看,大部分解决方案提供商热衷于面向行业大型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升级改造方案,很少有服务商能根据中小微企业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管理、服务等场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数字化转型需要有新的人才,尤其是既懂生产工艺又熟悉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在中小微企业,这类人才普遍较为短缺。

因此,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一是鼓励行业领先企业根据中小微企业的特点提供一批更符合需求的解决方案。要根据行

业、企业的具体情况,抓住行业数字化转型关键共性问题和企业个性问题,开发出一批前期投入较小、见效较快、容易上手的转型方案,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力。重点鼓励开发者找准中小微企业的痛点,开发一些解决中小微企业行业共性问题的轻量级应用。

二是以供应链、产业链中数字化水平较高的龙头企业为关键节点,形成数字化转型生态。龙头企业以数字化采购、生产协同、设备共享、数据共享等方式,逐步提升中小微企业融入数字化生态,从而由点到线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是出台一批鼓励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建立数据融通机制,鼓励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内进行数据共享,实现数据要素跨行业、跨区域流通,以数据融合促进数字化转型。探索建立多元化、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强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支持。可以通过示范试点的方式,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购买数字化转型所必需的基础软件、云计算服务、数据开发平台等支撑手段,以免费或优惠的价格提供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贯彻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以鼓励创新为主,建立起柔性监管机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洞见